

知識天地

斷裂與匯聚：當代台灣史研究的多重知識系譜

張隆志助研究員（台灣史研究所）

台灣史研究自1980年代後期以來，由於解嚴後言論思想的自由多元、各種檔案文書的開放，當代新興思潮的譯介，以及新生代人才的投入，歷經二十餘年的蓬勃發展，在史料發掘、課題開發、人才培育及國際交流等方面均有重要成果，成為台灣人文社會學術最具活力的新興領域之一。欲理解當代台灣史研究的豐富而複雜的學術內涵，以及多元而異質的言論景觀，固需重視1980年代解嚴前後台灣政治社會的外在動因，更不容忽視近代以來台灣史研究的長期學術脈絡。具體而言，當代台灣史研究的知識系譜，可溯自十九世紀後期的日本殖民地研究、二次戰後的中國地方史研究，以及1960年代的西方區域研究等多重學術傳統。並受到晚清及日治時期台灣史書寫、戰後海外反對運動，以及解嚴前後島內民主運動等本土歷史論述的影響，茲分別加以介紹。

（一）日本殖民地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1895年以後由東京帝國大學學者所進行的台灣探險調查，開啟了日本殖民地學術研究的先聲。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教授Ludwig Riess的《台灣島史》Geschichte der insel Formosa（1897）一書，可視為學院台灣史書寫的里程碑。而日本統治前期由官方殖民歷史編纂與調查成果，可以竹越與三郎的《台灣統治志》（1905），以及後藤新平推動的台灣舊慣調查事業，尤其是岡松參太郎等人編纂的《台灣私法》及《清國行政法》等重要史料為代表。

日治中期的台灣史料編纂與研究業績，除1922年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委員會的《臺灣史料稿本》外，以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後的台灣相關研究為主。例如文政學部史學科南洋史講座村上直次郎的荷蘭文獻調查、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移川子之藏等人的原住民傳說系譜研究、理農學部富田芳郎的聚落地理學等，均為代表性學術成果。而日本台灣研究先驅伊能嘉矩的遺著《台灣文化志》（1928），以及東京帝大殖民政策講座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1929），則被譽為台灣研究的經典名著。

日治後期台灣歷史民俗的研究，可以《民俗台灣》雜誌為代表。由台北帝大醫學部金關丈夫，結合池田敏雄、立石鐵臣、楊雲萍、陳紹馨、戴炎輝、黃得時、吳新榮、莊松林及曹永和等人，致力保存台灣地方文化。上述台北帝大的研究傳統，隨著1945年日本戰敗而中斷。僅有岩生成一及中村孝志等個別學者，延續其近世東西交通史和荷蘭時期台灣史的研究。直至1960年代，方有留日台灣學者，如涂照彥、劉進慶、許世楷、黃昭堂及戴天昭等人，分別從事台灣經濟及政治外交史的研究。而戴國輝更於70年代初期創辦「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結合若林正丈、松永正義及春山明哲等日本學者，從事台灣近現代史料蒐集，以及霧社事件等課題的先驅性研究。

（二）中國地方史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明清時期的中文台灣文獻，以方志編纂為主。如清代共刊刻台灣府廳縣志凡二十餘種。而日治時期由台人以傳統史學體例撰寫的台灣史著，則首推連橫的《台灣通史》一書（1920）。1949年後由大陸遷台的中國學者傅斯年等人，以中央研究院及台灣大學為據點，延續中國現代史料學派的學術傳統。而中西交通史家方豪及中國近代史家郭廷以，分別展開其台灣史研究。經濟學家周憲文則於台灣銀行創立經濟研究室，並自1957年到1972年間刊行《台灣文獻叢刊》309種，為台灣史研究奠定堅實基礎。另一方面，由陳漢光於1951年12月創辦出版的《台灣風物》，以日治時期《民俗台灣》雜誌同仁為班底，成為戒嚴時期的少數民間台灣研究刊物。

戰後學院的台灣研究的發端，可以1965年11月台灣大學文學院舉辦的「台灣研究在中國史學上的地位」學術討論會為代表，會中陳紹馨曾發表〈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台灣〉重要論文。其後在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下，由許倬雲及陳奇祿陸續主辦「台灣研究研討會」，並推動「台灣口述歷史計劃」。至1970年代，則有張光直主持的「濁大計劃」，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等計畫，引進西方社會科學方法及區域研究等新取向（詳下節）。

至於戰後官方的台灣史研究，則以地方文獻編纂為主。1946年至47年間臺灣省編譯館館長許壽裳，曾邀請台灣

史家楊雲萍、留日學人朱雲影、及台大留用日本教授國分直一等人從事台灣文獻編纂計畫未果。1948年6月台灣省通志館設立，以林獻堂為館長，旋於1949年6月改為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至1965年期間，曾由黃純青及林熊祥邀集多位台籍學者編修《臺灣省通志稿》。至1970年代則有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與省文獻會合辦「台灣史蹟源流研究會」活動，並由林衡道等人推動地方文史調查和古蹟研究。

（三）西方區域研究傳統中的台灣史

二十世紀初期英文台灣史先驅作品，可舉William Campbell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 (1903)，以及James Davidson的The Island of Formosa(1903)為代表。1960年代後期，西方學者陸續至台灣及港澳泰國等華人社會進行田野研究。台灣的豐富明清檔案及日文資料，亦受到西方學界的注目。除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外，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成立台灣研究小組，另有猶他家譜學會致力於台灣族譜調查。其主要成果可以王世慶對民間古文書的搜集整理為代表。他於1974年到1978

年間，協助美國猶他家譜協會搜集1,218件台灣族譜，並為美國亞洲會台灣研究小組編輯《台灣研究中文書目》。而其在1976到1983年間，所採集影印的〈臺灣公私藏古文書〉，共5,691件，更是台灣文獻界的重要成就。

1970年代美國東亞研究學界關於台灣史的主要成果，除了William Speidel(史威廉)的劉銘傳研究外，還有Leonard Gordon的晚清外交史，Ronald Knapp的歷史地理與鄭成功研究，Harry Lamley（藍厚理）的清代械鬥與台灣民主國研究，Beatrice Bartlett（白彬菊）的故宮檔案研究，以及Ramon Myers（馬若孟）的經濟史與日本殖民帝國研究等。而Johanna Meskill的清代霧峰林家研究，與E. Patricia Tsurumi的日治殖民教育史研究，則與80年代Thomas Gold(高隸民)的政治經濟史及John Shepherd（邵式柏）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成為戰後英文台灣史的名作。

1970年代由旅美考古學家張光直主持的「濁（水溪）大（甲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研究計畫」，以及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推動的「中國現代化區域研究計畫」等科際合作的集體研究計畫，提供台灣史學界不同於傳統文獻學及地方史的研究視野。這兩個大型研究計畫除了引進社會科學的觀點，並培育了新一代的台灣史研究人才。而陳其南及李國祁等人所提出的「土著化」與「內地化」理論，更成為80年代台灣史的重要討論課題。

（四）戰後海外反對運動及島內民主運動的台灣史論述

欲理解80年代本土歷史研究的知識系譜，亦不容忽視戰後海外台灣人反對運動及島內民主運動等學院外台灣史論述的重要影響。例如1960年代由史明與王育德等日本台獨運動者，以及前美國駐台副領事George Kerr等人的作品。史明為左翼台獨運動者，1962年以日文出版《台灣人四百年史》。王育德為東京大學語言學博士，1964年出版《台灣：苦悶するその歴史》（中譯：《苦悶的台灣》）。而George Kerr的Formosa Betrayed（中譯《被出賣的台灣》）出版於1965年。上述作品在戒嚴時期曾廣泛流傳與海外台灣政治異議人士及留學生社會，其中文譯本更以地下禁書方式在台灣島內流通，成為許多讀者的台灣史啟蒙讀物。至1970年代中後期諸如《台灣政論》、《夏潮》、《八十年代》



圖片 1：當代台灣史的研究與書寫，呈現出多元而豐富的言論景觀。



圖片 2：台灣史多重知識系譜的重建與解析，為台灣史學史研究的基礎工作。

以及《美麗島》等黨外運動雜誌，對於台灣政治、歷史與文學的介紹與評論，亦成為解嚴前後台灣歷史意識與本土史觀的論述資源。

台灣異議雜誌的歷史，源自於日治時期《台灣青年》、《台灣》及《台灣民報》等刊物。戰後則以195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胡適和雷震等人所創辦的《自由中國》、1960年代《文星》雜誌、1970年代初期《大學》雜誌等為主要標竿。至1975年台灣菁英黃信介及康寧祥等人，共同籌劃出版《台灣政論》，探討國會全面改選、解除戒嚴、解除報禁黨禁等主題。1979年則有《八十年代》和《美麗島》雜誌，分別主張議會改革及群眾運動的黨外民主運動路線，並強調台灣意識及台灣史地。而1976年由陳映真、陳鼓應、王曉波、蘇慶黎及王拓等人創辦的《夏潮》雜誌，則以民族、左翼、鄉土為號召，介紹台灣抗日、工農運動、文化協會及帝國主義侵華及五四運動史實。1977至1978年間，更引發鄉土文學論戰。至1980年代，黨外雜誌經美麗島事件衝擊後更加蓬勃，並出現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論爭，成為解嚴以來台灣族群政治及國族認同問題的先聲。

上述關於台灣史研究多重知識系譜的初步重建，提供吾人從史學史、方法論及知識社會學等觀點，重新理解當代台灣史研究內涵的討論基礎。政權轉移的頻繁以及族群關係的複雜，是台灣史發展的主要特徵。此一多重殖民及移民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形成台灣史料在語言及內涵種類上的豐富與多樣化，另一方面則導致台灣研究及歷史書寫傳統的斷裂與重層化。未來如何從近代東亞各國史學典範的形成與變遷、不同時期台灣史研究的趨勢與特色、以及東亞周邊與亞非拉地區後殖民史學的對照和比較等分析視野，深入理解台灣近代歷史知識生產與典範轉移的複雜軌跡，將是台灣史學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和方向。

參考資料：

張隆志，〈當代臺灣史學史論綱〉，《臺灣史研究》第16卷第4期（2009年12月），頁161-184。